

清末学堂运动会兴起的动因及影响

马军¹, 王华倬², 王乐乐²

(1.黄河科技学院 艺体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06; 2.贵州大学 体育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清末学堂运动会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竞赛场, 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 是学校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场域。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 对清末学堂运动会兴起缘由进行全面梳理与考察, 以期钩沉出运动会蕴含的历史价值及产生的深远影响。研究认为, 学堂运动会兴起的动因可归结为5点:“尚武精神”为其兴起奠定观念层面主基调;赴日教育考察为其引入提供直观参考;兴学热潮为其普及提供政策依据;京师大学堂运动会在其推广过程中起到了率先垂范作用;军国民教育案为联合运动会的举办提供制度遵循。基于以上缘由, 其历史影响包括3个方面:体育观念冲破思想先驱局限, 由个体性、散发性转向群体性、系统性;“挽积弱而图自存”的实用理性占主导, 体育自身价值隐匿于社会诉求之中;“师法日本”的指导方针影响了学堂运动会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 体育史; 晚清体育; 学堂运动会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6)01-0135-09

Reason and effect of the rise for school sports mee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 Jun¹, WANG Huazhuo², WANG Lele²

(1. Department of A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Zhengzhou 450006,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hool sports meeting was not merely competitive arenas for sports events, but also served as unique social spaces, and also crucial venue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society. By using method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rise of school sports mee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 as to uncover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five key factors driving the emergence of school sports meeting: the spirit of "martial art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rise; educational visit to Japan provided intuitive reference for their introduction; the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s offered policy basis for its popularization; the sports meeting at Peking University set a pioneering example in its generalization; the Military-Citizen education proposal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idelines for organizing unified sports meeting. Based on these reasons,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school sports meeting can be summarized in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ranscended the limitations of early advocates, shifting from individual and sporadic efforts to collective and systematic endeavors; a pragmatic rationality centered on "reversing weakness and striving for self-preservation" dominated, caus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ports to become overshadowed by broader social demand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learning from Japan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school sports meeting.

Keywords: sports history; sports in late Qing Dynasty; school sports meeting

清末学校运动会作为一种社会新风尚传入中国。
从运动会传入的学校类型来看,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其肇始可追溯至1890年圣约翰大学举办的田径运动会,为近代中

国学校运动会之嚆矢^[1]；其二，新式学堂所举办的运动会，以1897年北洋大学堂举行“大学堂赛跑”^[2]为标志，为近代中国本土学堂运动会之开端。清末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此时，运动会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竞赛场，还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空间，是学校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场域。其中，新式学堂运动会的兴起，背后的动因多重且复杂。其演进历程始终与现实社会需求紧密相联，既涵盖新旧观念的碰撞与交融、社会风尚的树立与传播，还呈现出运动会与民族兴衰、国家强盛间的紧密关联。

鉴于清末学堂运动会处于中国近代运动会的开始期，展现出政治、文化、教育、体育等多重功能属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的历史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如对清末学堂运动会的溯源^[1-3]；对某一学堂运动会的历史考察^[4-5]；对区域性学堂运动会的全面审视^[6-8]；从微观活动视角深描学堂运动会的人物活动及其社会价值^[9-10]。已有研究为探究近代运动会兴起的历史现象奠定坚实基础，并提供丰富史料线索，具有重要的启发、参考及指引作用。

然而，清末学堂运动会为何能迅速兴起，并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究，以期钩沉出学堂运动会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1 清末学堂运动会兴起的历史概貌

清末伴随学堂在全国的开办，在“尚武”思潮激荡下，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新风尚，成为当时学校重要的教育活动，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学堂运动会的报道广见于全国各大报端。1897年《国闻报》以“大学堂赛跑”为题报道北洋大学堂举行的运动会，为近代中国本土学堂运动会之开端。竞赛项目包括：跑带跳一百码、赛掷重物、跑带跳二百二十码、先跑后长跳、先立后长跳、跑袋、跑围墙一周、跑兼拾物、绕场围跑三周、持棍高跳、先跑后高跳、赛递物等^[2]。

1899年《国闻报》刊载了北洋大学堂与铁路学堂、水师学堂联合举行赛跑的情形^[11]，开中国近代校际运动会之先河。竞赛项目包括：跳跑、跑二百码、跳远、跳高、退跑、穿袋跑、口含羹匙顶鸡蛋于匙内跑、赛脚车慢、赛加法并行速、四人来去跳、小孩赛一百码跑。

而后，“运动会之设发起于江鄂之间”^[12]，浙江^[13]、湖北^[14]、湖南^[15]、四川^[16]、山东^[17]、河北^[18]、广东^[19]等地学堂相继举行运动会。就连吉林^[20]、广西^[21]、云南^[22]、贵州^[23]等地区的学堂也陆续开始举办运动会。其中，

1905年京师大学堂首次举行运动会，竞赛项目包括：掷槌、八百米突竞走、跳远、二百米突竞走、掷球、跳高、顶囊竞走、一百米突竞走、提灯竞走、犬牙形竞走、三百米突竞走、四百米突竞走、脚竞走、六百米突竞走、掩目拾球竞走、越脊竞走、二人三脚竞走、拉绳、来宾竞走、职员匙蛋竞走、一千米突竞走等^[24]。尽管京师大学堂并不是最早举办运动会，但其“总学堂”地位，为全国各地学堂做出表率，起到示范作用。

受“师法日本”教育方针的影响，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基本沿袭京师大学堂仿日体操运动会的举办模式。1907年在南京举办“宁垣第一次运动大会”^[25]，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校际运动会，宏育书院、两江师范、浙江公学、湖南公学、湖北公学等80余所学校参加，竞赛项目主要有体操、武装竞走、戴囊竞走、夺旗竞走、横跑竞走、拉绳、三足竞争、游戏竞争、写字竞走、提灯竞走、高跳、球战等。以上运动会的竞赛形式、项目与日本学校运动会相似。如1906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第六次陆上运动会竞赛项目包括：蛙飞竞走、障碍物竞走、球拾竞走、高飞、幅飞、投锤、担架千鸟竞走、支度竞走、盲哑竞走、骑马拟战、长距离竞走、角力、地方协同徒步竞走、速画竞走、游戏行进与徒步体操、优胜旗竞走、曳纲等^[26]。

至此，清末时期新式学堂运动会的组织形式及内容已基本确立，竞赛项目主要包括游戏、体操和赛跑等，与教会学校的美式运动会大相径庭。此时期，是仿日体操运动会与美式田径、球类运动会并行发展的重要时期。

2 清末学堂运动会兴起的历史动因

学堂运动会的兴起与西学东渐社会潮流同步，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历史产物。运动会不仅是体育运动的赛场，还是师生活动的社会空间。学堂运动会的复杂性映射出当时国家、社会和教育的现实诉求，以及这些诉求对其产生的影响。

2.1 “尚武精神”：学堂运动会兴起的观念指引

清末时期尚武之风，始于学堂运动会，“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27]。随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相继失败，面对强邻环伺下的内忧外患，新知识群体主体意识渐趋觉醒，激发出改造社会的新意识，即“尚武精神”。新知识群体主要由接受西学的开明绅士、青年学生所组成^[28]。他们基于对国家存亡的深刻危机感，直指“贱武右文”的价值倾向，对传统教育中“重文轻武”观念展开全面批判。从严复提倡的“鼓民力”到梁启超论述的“论尚武”，知识精英们从学理层面深

入剖析“尚武精神”的培养路径及其所需条件。“尚武精神”逐渐得到新知识群体的广泛认同,为清末学堂运动会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因此,清末新式学堂举行运动会,不仅是为推广体育运动,举办者们更希望借助运动会宣扬“尚武”精神,将体育与强国联系起来,试图把体育作为拯救民族危机的良方之一。

1905年长沙武备学堂举办第一次运动会,筹备公文中陈述道:“我国士气文弱体育不尚,非设大会以振厉鼓荡之,不足以奋尚武之风。”^[29]同年,四川学务处筹备武备学堂第一次运动会时提到,“积文成弱固已久矣……体操之设所以作其尚武之精神,运动之会所以养其协同之动作”^[12]。即便是女子学堂的运动会也洋溢着“尚武”精神,1906年上海务本女塾运动会歌可见“尚武”精神之印迹,“盛会重行,强国莫如尚武,勿言巾帼无人唤醒,同胞大家努力,着鞭猛向前程”^[30]。

1906年京师大学堂第二次运动会告来宾文中,阐明运动会与“尚武”的联系,“夫运动会之设,所以重体育而奖武事,为国民教育最重要之一端。迩者,学部疏请明定教育宗旨,宣示天下于掷球、角力、运动、竞走辄标举之以为尚武之征”^[31],唯有全民秉持“振武之精神以自强的信念”,方能实现救弱图强目标。运动会场大门悬挂“尚武”两字匾额,《大公报》记者“无我生”为之感叹,“运动会以鼓起尚武精神,其所期望之目的亦不过为,少年为壮夫,扫除五千年右文轻武之积弊而已”^[32],“中国风气开通年胜一年,谁谓睡狮终不醒乎?”^[33]。

1908年吉林学界第一次运动会上,吴学使在开幕演说中直言,“近世泰东西各国莫不以体育为当务之急,其兢兢于体育者殆以国家之成立,在有文明之精神,尤在有野蛮之体魄也”^[34]。“尚武”精神,借助运动会经由官员、士绅的宣扬,加速其在社会中的传播,起到开通风气的作用。

体操,尤其是兵式体操,相较于西式田径或球类运动,更能彰显严肃整齐、协同有序、奋发有为的“尚武”精神风貌,更贴合国家意识的社会诉求。1907年两江总督札饬南京文武学堂合开运动会文中明确阐明,通过运动会的体操、兵士体操表演来宣扬尚武精神的作用,“体育之术在平时,以练习柔软、器械、兵式各项体操、各种技术为要。在岁时考绩尤必有会合运动,以起人之观感而扬厉其尚武之精神”^[35]。为此,学堂运动会采用了彰显“合群”“尚武”等国家意识的体操和兵式体操作为竞赛内容,而竞技和体育的价值则相对淡化,隐匿于社会现实需求之中。

2.2 赴日教育考察: 学堂运动会兴起的直观参照

赴日教育考察人员的文化反思,是促进清末教育

改革以及体育观念转变的文化心理动力。1902年项文瑞游历日本参观高等师范学校运动会后有感而发,日记中阐发了提倡勇武、重视体育的主张,“争竞之世界,既不能闭关谢客,即不能不奋勇以力与之角。而欲与之角,不能不在学校中寓武于文,而发端在体操,故体操不可不急讲求也”^[36]。严修曾两赴日本,深度考察二十余所学校。这段考察经历对严修的教育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导致他在担任学部侍郎一职时,借助赴日考察经验执笔拟定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强调“尚武”为中国民质中亟需提倡的教育宗旨之一。这些观念与主张不仅使“尚武”精神由单纯的社会舆论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也为运动会的推行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客观上促进学堂运动会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

赴日教育考察促进了运动会相关“新词”传入。新词的出现,不仅为体育课程实施和学堂运动会推行提供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的工具,更为运动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提供思想、理论与知识的储备。据考证,1889年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较早记述了学校开运动会的场景,“至墨江观其竞渡,而自标曰‘帝国大学运动会’”^[37];1899年丁鸿臣《游历日本视察兵制学制日记》中详细介绍师范生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柔道、击剑、击枪、弓技、器械、体操。又以时习水泳、漕橹、远足之事”^[37];1907年楼藜然《蔷薇东游日记》记载运动员参与比赛情景,并提及“选手”这一词汇,“选手竞争,彼三匝而吾二匝,种族之强弱见焉”^[37]。

赴日教育考察人员还对运动会的竞赛情况进行全面介绍。在他们的日记中,可清晰地感受到同时期日本与清末学堂运动会竞赛项目的相似之处。如1902年项文瑞参观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秋季运动会时记载的竞赛项目情况,有合背竞争、球竿竹马竞争、蛙飞竞走、记忆竞走、军舰竞走、抽签竞走、绳飞竞走、球拾竞走、铁锤、各级选手竞走、旗取竞走、武装网潜、障碍物竞走、千鸟竞走、角力等25项^[38]。

上述竞赛项目亦见于游记和译作中,如1906年程清在《丙午日本游记》中记录了学校开运动会的场景,详细介绍竞赛项目名称及方法,宏文学校竞赛项目有二人三脚、轮潜、蛇行进、炮垒攻击、母衣竞走、搬人竞走、陆上端艇竞走、依负竞走、障碍物竞争、兵式体操、来宾竞走、优胜旗竞走等;高等师范学校第六次陆上运动会亦有类似的竞赛项目^[26]。

1906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最新陆地运动教科书》^[38],该书由李汰翻译自日本志岐助二的著作,书中将日本学校运动会竞赛项目分为机械竞技、多人共

同竞走、技术竞技、自转车竞走及码竞走4类，并系统介绍各类竞赛项目的规则及方法。该书可能是中国较早系统介绍日本运动会的一部译著，其中涉及竞赛项目在清末中国学堂中均有不同程度体现。

由此可见，当时竞赛项目主要以竞技性游戏和赛跑类为主，竞赛项目的命名及其运动规则仍处于杂乱、随意状态，缺乏统一、规范表述。1908年盛宣怀赴日考察时，参观同文学校运动会，在日记中提到“其运动各技与中国学校同”^[39]。表明清末学堂运动会带有移植自日本的痕迹，受到了日本模式的深刻影响。这与同时期由教会学校所主导，以田径和球类为主的竞赛项目形成鲜明反差。

此外，教育考察人员对运动会产生的影响，并未随着清朝灭亡而消失，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初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国近代学校运动会的发展轨迹。如1903年赴日本留学的近代著名教育家经亨颐，1912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陆上运动会上，作为校长发表了《关于运动会之经验与意见》，文中阐述他在日本求学8年间亲身经历的5次运动会。回国后，在创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过程中，又见证6年内的3次运动会。他感叹道“对于运动会之兴味及希望，学生时代不及今日。当时无非为运动会而爱运动会。今则不为运动会而爱运动会。为学校而爱运动会。且非为特为自己任事之学校而爱运动会。为一般教育、一般社会教育而爱运动会”^[40]。不难看出，他对运动会的认知转变与在日本求学的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当时“日式运动”会成为新式学堂主流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考察，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急速转变，“尚武”精神与“造新民”理念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借助体育(包括运动会)等手段来达到“救弱图强”的共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赴日考察期间他们撰写的游记、日记，以及归国后在运动会上所发表的演说等，均深刻体现了这一观念的转变。

2.3 兴学热潮：地方官员借运动会表“兴学”功绩

清末“新政”时期，兴学热潮成为推动学堂运动会兴起的重要动力。面对士子的“空疏无用”“浮薄不实”，清政府痛下决心革除积弊、“敬教劝学”。1901年9月颁布“兴学诏”，决定在全国建立各级各类学堂，

“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直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41]。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设视学官；次年设提学使司，以学务公所、劝学所和学区分管省、府厅州县级乡镇教育，同时吸收地方士绅参与教育事务。在此政策推动下，官办学堂逐年倍增，由1905年的2770所增至1909年

的14344所^[42]。为尽快实现兴学目标，清政府把兴学、办学的业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为此，各地方官员通过举办运动会，一方面向上级展示、汇报劝学、办学之成效，另一方面向社会各界宣扬“劝学”的价值与意义，以期劝导适龄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

各地方官员对兴学的热衷更倾注于精神教育方面，将举办运动会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1907年永清县学董朱致瀛向提学司禀报学堂运动会举办情形，文中强调，“教育之事在精神，不在形式。而精神能随形式以发现。乃真精神尚秩序、尤尚竞争。而秩序不因竞争而破坏乃真秩序。运动会所以为教育之一要素也”^[43]。他提出运动会宗旨为“以鼓舞精神开通风气”，学台对此批示“教育精神为之一振”。

1908年临榆县令谭垚振向学台呈报开办运动会情况，着重强调运动会是精神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临榆学务开办至今少臻完善，惟运动会未开。徒具教育之形式，不能见教育之精神”^[44]。学台对此表示认同与赞赏，批示道，“据详开办运动盛会具见官绅提倡教育之热心，殊深钦佩”^[44]。1909年新民召开学界春季运动会，在开会致辞中明确指出开办运动会是为检视办学成效，“运动会为观察各学堂教员一切管理教授上诸法，各学生之真气，与公共之法并尚合群之概念，以去其卑劣新为目的”^[45]。

1907年宁国府端本学堂的运动会宗旨为“振刷精神，发扬体魄”^[46]。同年，上海龙门师范学校第4次运动会的宗旨为“锻炼体力实践道德”与“敦尚朴素”^[47]。两则宗旨均体现对精神教育的重视。基于此，运动会上对优胜者没有颁发奖品，以“尊重高尚之品格”；运动场不特加装饰，不为来宾特设饮食物品用以招待。

可见，地方各级官员重视学堂运动会的主因是为表彰兴学功绩，宣扬办学成效，将运动会视为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开风气、启民智的重要手段。

2.4 “不树风声 鼓舞士气”^[48]：京师大学堂运动会的率先垂范作用

1905—1907年京师大学堂，连续举办3次盛大运动会。其在引领舆论、树立学界新风方面起到表率示范作用，相较于在运动会组织方式和竞赛项目上的引入与推广，其表现出的引领示范作用更具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发挥统领全国各学堂的作用。“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京师大学堂具有全国“总学堂”的重要地位。1898年《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

当遵依此次所定, 务使脉络贯注, 纲举目张”^[48]。京师大学堂作为“总学堂”的表率示范作用, 在其第一次运动会告来宾文中得以体现, “今日特开运动大会, 亦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匕〔化〕……直隶、湖北等省屡开运动大会, 若京师首善之区, 尤宜不树风声, 鼓舞士气”^[49]。该文彰显京师大学堂倡导风气、树立典范的方针, 供全国各学堂借鉴。此举对于推动各级学堂运动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京师大学堂为彰显在全国学堂中的典范地位和表率作用, 特邀请包括京师附近, 以及其他省份的学堂共同观摩运动会。这在当时交通条件尚不便利的情况下, 足以突显其重视程度、号召力及广泛影响力。据《大公报》报道, 参加京师大学堂第二次运动会的学堂包括: 强务学堂、湘学堂、蜀学堂、江苏学堂、皖学堂、豫学堂、豫章学堂、求实学堂、崇实学堂、广益学堂、顺天中小学堂、五城中学堂、北洋官立第一小学堂、八旗高等实业学堂、内务府三旗学堂等, 其中湘学堂、强务学堂还带军乐队前来助威。女学堂虽均为私立学堂也来观摩, 主要有: 振懦女学堂、传习所淑范女学堂、豫教女学堂等。此外, 运动会专设“各官立学堂竞走”项目,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运动项目在各学堂的普及, 并为各学堂举办联合运动会奠定基础^[50]。可见, 京师大学堂运动会的影响力波及包括官办、私立、男女及实业等各地各级各类学堂, 对清末学堂运动会的兴起产生极为重要示范效应。

京师大学堂还特邀外国公使馆人员、在京各部官员、社会人士等共襄盛举。为扩大运动会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次运动会的敬告来宾文还译成英文在报纸上广而告之。《大公报》记载了当时开会盛况, “初三日到者极众, 红其顶、花其翎者不计其数, 即各国人之到者亦多”^[51]; 此外大会还设有“来宾竞走”项目, 不仅运动场内较为拥挤且在会场外没有入场券者还有千余人, “各学校乐与观成, 联花借来, 观者如堵, 龟鼓声逢, 龙旗景动, 风声所树, 举国景从”^[52]。全社会兴学热潮的推动, 再加京师大学堂的引领示范, 运动会以各省大学堂为中心, 逐步在各级各类学堂中广泛开展起来。

2.5 酝酿军国民教育案: 为学堂联合运动会兴起提供制度遵循

清末军国民教育实质上是尚武精神在教育实践层面的延伸及具体反映, 两者互为表里, 相互依存。如果说尚武精神是学堂运动会兴起的思想先导, 那么军国民教育为学堂联合运动会的推行提供了制度遵循与行动指引。此时, 运动会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各学堂自行举办, 二是多所学堂共同参与。而共同参

与的联合运动会兴起与军国民教育的推行密切相关。

1906—1911年, 正值军国民教育处于发展阶段, 与联合运动会的兴起恰好同步且密切相关。1906年《奏陈教育宗旨折》“尚武”宗旨中, 首次提及参照日本学校举办运动会, “尝查询日本师范学校矣, 师范为规制最肃, 约束最严之地, 而掷球、角力习为常课, 运动、竞走特设大会, 其国家且宣法令以鼓励之, 其命意可知矣”^[53]。至此, 举办运动会不仅被视为学堂办学新风尚, 而且从教育制度层面为运动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促使运动会从社会风尚转变为制度化实践。

1911年4月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决《军国民教育主义案》, 呈请学部实施军国民教育, “庶尚武精神, 不至徒托空言, 而与奏定章程注重体育之本旨, 将先后相符矣”^[54], 该案明确提出高等小学及同等以上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 要求各学堂设运动部, 由擅长体育运动的教师担任部长, 监督学生从事体育运动^[55]。此方案虽未明确将运动会纳入军国民教育体系, 但已表明教育界人士除重视兵式体操训练外, 也开始关注学生课外锻炼和体育运动, 并表现出将其制度化的设想。此举为将运动会纳入军国民教育体系进行制度性铺垫。

1911年7—8月中央教育会成立大会上议决《军国民教育案》, 该案由陆军部、学部以及唐文治3个提案整合而成, 表明军界、政界、学界从各自利益出发, 都对军国民教育高度重视。为此, 该案成为此次会议争论焦点, 历经5次审议, 成为讨论时间最长、争议最为激烈的议题^[56], 充分表明当时社会各界对军国民教育的重视与关注。由学部提议的《军国民教育咨询案》, 将运动会、体操、户外运动及野外演习、拳棍刀法5项体育活动纳入军国民教育的实践环节中, 明确规定学堂宜于春秋两季举行陆上或水上运动会。会议期间还就运动会议题展开3次激烈讨论, 第三次会议提议“由学部规定联合运动会之规则及礼式一律推行”^[57]; 第九次会议提议“运动会当开由学部编订礼节”^[58]; 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了运动会专有名词界定以及运动会后休息日等具体事项^[59]。至此, 《军国民教育案》的出台, 为运动会的举办提供了制度遵循, 有力推动运动会在各级各类学堂的推广与普及。

在军国民教育的推动下, “振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成为各地积极举办联合运动会的重要观念指引。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江苏省教育总会会长唐文治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 他与刚从参加中央教育会归来的该校斋务长陆规亮, 共同商定发起“苏省各学堂联合运动会”。明确提出举办联合运动会的初衷, “以苏省风气懦弱, 非竭力提倡体育不足以振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60], 随即拟定“苏省各学堂联合运

动会简章”，简章阐明运动会宗旨：“提倡学校体育，诱掖社会体育，以期养成军国民资格为目的，并非角逐剧烈徒逞一日之短长。”^[56]

一时间各地学堂纷纷举办联合运动会，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各学校间交流与联络，鼓舞士气、提振精神，践行军国民教育，宣扬尚武精神。此时，新知识群体亦日益关注运动会对塑造军国民精神之影响。朱估生在《余之提倡体育观》一文中，阐明当时小学校掀起举办联合运动会热潮的原因，旨在引导社会风气由文弱之士转变为崇尚军国民主义，“健全之精神必宿于健全之身体。矧以积弱之国民，而欲提倡军国民主义，尤不可不积极进行”^[57]。《民立报》发表评论文章，阐发了运动会与军国民教育间的紧密关联，倡导借助运动会之力培育军国民精神，“惟运动会实可以引起民间体育的观念，望学界中人其一提倡之，庶使文弱之士一变而为军国民矣”^[58]。由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牵头组织的苏州、南京各学堂举办联合运动会时，田光在《民立报》中发表评论称：“矧今者外患日迫，所谓军国民之教育尤当应时而起，对此春光念兹时局，学生乎、学生乎，而当急起粹厉尔精神、锻炼尔体魄，尔当以婉美之军歌鼓舞。我民尔当以尚武之精神宣扬我国威，勿使东夷西狄笑我也”^[59]。1910年苏州府中学堂发行的《沧浪杂志》中，刊发诗词表达对该校学子参加联合运动会的热切期待，“运动盛会将开，少年尚武，技勇都超绝。联翩逐队，争前列。此日锦标先夺，努力围场，合群角胜，国耻期能雪。唱凯归来，休说此优他劣”^[60]。一时间，军国民教育的推行促使运动会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尚武”观念渐入人心，并在新知识群体，尤其是学生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客观上加速了近代体育思想传播和体育认知深化。

3 清末学堂运动会的历史影响

3.1 体育观念冲破思想先驱局限，由个体性、散发性转向群体性、系统性

清末国家积弱垂危，思想先驱们纷纷疾呼“强国强种”，催生崇尚武力的社会思潮。最初，尚武精神的鼓吹，无论是严复提出的“鼓民力”，还是梁启超倡导的“造新民”，影响范围有限，主要局限于部分思想先驱，多聚焦于个体层面。

随着新式学堂开办，新知识群体崛起，人们开始批判传统教育观念，产生新思想、新观念，逐渐突破思想先驱范围内的局限，扩展到接受西学的开明绅士、教师、青年学生群体。此时期，学堂运动会的开始与国家强盛、民族存亡密切相关，其主旨在于弘扬“尚武”精神、提振民气。1905年《大公报》发表篇名为

《说运动大会》的专题评论，揭示了当时社会对体操、体育及运动会所持有的普遍认识，进而明确运动会在倡导“尚武”精神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要打算强国，非得强民气不可，要打算强民气，非得讲求体育不可。如今学堂全有体操一门，确是体育的根子，现在北京大学堂合天津大学堂，全开运动会，与会的甚为踊跃，足见体育发达，中国人尚武的精神，从此要鼓动起来”^[61]。

一时间，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尤其是作为时代生力军的学生群体，经由学堂运动会感召，提倡体育新风尚、转变体育价值观、改变身体行为。学生将这些观念带入社会，并影响身边人群，有力促进体育观念逐步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此外，学堂运动会及“尚武”精神之倡导开始受舆论界所瞩目，在舆论引导和观念指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06年天津《大公报》连续4日对京师大学堂第二次运动会进行详尽报道，评论中针对时弊阐述对“尚武”理念的见解，“举行大运动会以鼓起尚武精神，其所期望之目的，亦不过欲为少年壮夫扫除五千年右文轻武之积弊而已”^[62]。

新知识群体的崛起、舆论界的推波助澜，促使近代体育观念随着学堂运动会的开办而逐步传播。这一历史进程，使体育观念的形成不仅超越思想先驱的个体局限，而且由个体分散的现象转变为群体性、系统化过程，客观上推动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步伐。

3.2 “挽积弱而图自存”的实用理性占主导，体育自身价值隐匿于社会诉求之中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63]。清末这一环即“挽积弱而图自存”。面对强邻环伺、积贫积弱的中国，思想先驱们以及新崛起知识群体，将目光聚焦于自强图存这一中心问题上。

运动会在引入学堂之初，“尚武”精神便发挥着重要舆论导向和观念引领作用，留下“尚武”救国的深深烙印。如1905年京师大学堂召开运动会函告各学堂，“穷世界文明事业，皆强刚体魄之所造成也。吾国文事彪炳，而武力渐趋于薄弱。陵夷已至今日，为瀛海风涛之所卫激。士大夫之担学事者，乃知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64]。从中可深刻体悟到，运动会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空间，承载国家与民族的使命与责任。举办运动会的根本宗旨主要源自社会需求，其意义超越体育价值本身。

与此同时，乘西学东渐之风，伴随学堂运动会兴起，体育作为一种新风尚也渐趋深入人心，对体育自身价值的探讨与思考也日益得到关注。正如1905年

《申报》以“观模范运动会”为题的评论性文章, 对当时学堂盛行“尚武”之弊进行批判。该文章深刻剖析游戏运动与其他运动的差异, 阐发了开展游戏运动的价值, “一曰事事以共同竞争为主, 为其共同竞争也故可养成其公德心, 而不至以争个人之私利为亟。二曰可随时寓以有益之教训, 既不偏重于尚武一边, 亦不致学生为无规则之游戏。三曰量儿童之体力而无过度运动之虞”^[64]。可见, 人们已认识到“尚武”观念对体育影响之弊端, 开始思索体育本身的价值, 这为促进体育现代化转型做出思想铺垫。

在此过程, 虽然“尚武”精神的提倡与对体育自身价值的认识交织并存, 但从历史发展总体脉络看,

“挽积弱而图自存”的实用价值理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并超越追求体育自身价值的理性价值取向, 成为清末学堂运动会发展与变革主基调。实用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取向, 不仅深刻影响清末学堂运动会组织形式、竞赛项目的发展走向, 而且对民初军国民教育实施、乃至整个近代体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3.3 师法日本指导方针影响学堂运动会发展走向

中国社会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 模仿、移植是中国近代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清末运动会在学堂的引入与普及正值向日本学习的浪潮中, 其发展轨迹带有日本烙印。无论是鼓吹“尚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 以及赴日考察并将“尚武”列入教育宗旨的严修, 还是首提“军国民教育”东渡求学的蔡锷, 这些新知识群体都与近代日本尚武思潮的兴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

尽管清政府秉持“以日为师”的指导方针并付诸实践, 却未能挽回其覆灭的命运以及未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然而, 在西学东渐浪潮中, 运动会作为一种新风尚被引入学堂, 客观上促进了人们体育认知的转变, 对体育现代化转型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其一, 由新知识群体掀起“尚武”思潮, 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教育观念, 反思批判“贱武右文”的传统价值观, “耻文弱”之风在全社会流传。学堂运动会因其承载着政治、文化、教育、体育等多重功能, 具有社会与教育双重属性, 作为宣扬“尚武”精神的特殊载体, 成为学校与社会互动联系的重要纽带。此外, 清末学堂正是新知识群体兴起的发源地, 学生作为新生力量, 客观上加速了体育观念在传统社会中的传播, 为中国体育现代化转型提供思想源泉。

其二, 赴日教育考察人员、留日学生以及日本教习等人员, 对清末民初学堂运动会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其中, 清末赴日教育考察人员是兴学与教育改革的一支中坚力量, 他们在体验、比较不同的教育观

念及模式后, 更加坚定改革旧教育、推行新教育的决心, 促动他们直接或间接移植日本教育理念、体制和实践活动(包括运动会)。考察人员中大部分是具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官绅, 其考察成果更易于被政府及新知识群体所接受, 进而推动主张的实施。尽管清末学堂运动会在组织形式、竞赛方式、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模仿痕迹, 但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 一定程度上促进运动会在清末学堂的引入与推广。

其三, 军国民教育兴起为运动会制度化、体系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军国民教育案进一步明确学堂运动会的组织形式、内容及要求, 首次以教育制度形式确立了运动会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清政府消亡前后虽未得以切实落实, 然而经过激烈争辩与探索实践, 运动会作为军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在学界达成共识。军国民教育案的出台, 为联合运动会的举办与推广提供政策引领与行动纲领, 奠定清末民初新式学堂运动会发展主基调。这也是清末民初, 新式学堂以仿日运动会为主, 而与教会学校美式运动会并行发展的根源所在。

3.4 回归价值理性, 坚守学校运动会育人本质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张力, 西方现代性扩展, 必然带来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 进而打破二元平衡, 致使工具理性占主导, 使事物本身不再是目的而变成实现目的的工具手段。清末学堂运动会的演进历程也概莫能外,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矛盾张力中前行, 学校运动会沦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与工具, 而自身价值目标难以实现。

无论是教育与体育, 还是学校运动会, 他们都是社会运行中的一环, 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 作为体育和教育活动一部分的学校运动会也深受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处于运动会兴起期的清末, 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剧烈变革, 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因素对运动会的影响。运动会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途径, 也成为实现社会诉求的重要工具, 工具理性成压倒之势, 成为近代学校运动会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

正如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举办首届运动会时, 专门发表《运动会的需要》指出:“运动会本身, 本有许多长处; 前几年吾国运动会的弱点, 是由利用运动会的人制造出来, 不是他本身的坏处, 现在也快将绝迹了。”^[65]他强调运动会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 如“鼓励运动的兴会”“加增校外同学的社交”“养成公德”。可见, 对于学校运动会价值理性的认识, 社会各界较早有共识, 但近代以来受制于工具理性的强大势能, 价值理性的回归始终未能实现。

当代学者亦就此发出呼吁, “在某些历史时期, 学

校体育的工具化可能成为其自身发展赢得更多机会与空间，但无底线的工具化会导致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淡化，而给学校体育本身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这是极不可取的”^[66]。实质上，学校运动会的引入、发展历程的确得益于“挽积弱而图自存”社会需求的推动，但与此同时，学校运动会应具有育人本质及其相应的教育价值被淡化、边缘化，学校运动会理性价值的回归应提上日程，被人们所重视。

当今“双减”“体教融合”等政策落地与实施，对学校运动会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目前校内以及校际运动会的功利化色彩尚未消除，利用运动会为学校争得荣誉仍占主导，“常赛”难以实现。以史为鉴，我们还要警惕“工具理性”死灰复燃。当前，学校体育赛事普遍存在“重校外、轻校内”现象，将“比赛成绩”作为评价唯一或主要标准，导致为获荣誉而忽视多元化的教育价值。此现象出现，其实质是工具理性价值取向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忽视学校运动会价值理性主导下的育人本质。因此，运动会育人本质的理性价值回归是当前学校体育改革的应有之义。

4 结语

清末学堂运动会的兴起，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历史产物。其历史动因的复杂性，深刻揭示了自诞生之日起，中国近代学堂运动会便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承载了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重功能与价值，其价值取向兼具实用理性与价值理性特征，这也是运动会至今仍受各级各类学校重视的根源所在。通过深入探寻清末学堂运动会演进历程，探究其兴起的历史缘由，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教育改革或体育实践活动，若一味照搬照抄，都难以取得良好成效，唯有坚持独立自主、不断创新，方能收获实效。以史为鉴，审视当下，有助于深化对运动会多重价值的理解，引导思考运动会的当代价值内涵，进而为学校运动会的改革以及学校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 [1] 周西宽. 旧中国运动会史略[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0(1): 7-23.
- [2] 佚名. 大学堂赛跑[N]. 国闻报, 1897-11-29(2).
- [3] 刘朴. 对中国近代运动会的起源及名称演变的探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6): 135-139.
- [4] 肖冲. 京师大学堂体育考[J]. 体育文史, 1988(4): 31-32.
- [5] 李权. 我国开展近代体育运动的先行者和启蒙者——北京潞河中学[J]. 体育文史, 1997(3): 35-37.
- [6] 谭华. 近代体育运动在四川的初期传播[J]. 四川体育科学, 1982(Z1): 97-102.
- [7] 俞宏. 中国近代早期的一次大型运动会——两广学务处校际运动会[J]. 体育文史, 1993(3): 35-36.
- [8] 刘中正. 清末及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举办运动会的初步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11, 47(3): 104-111.
- [9] 郎净. 近代体育在上海 1840—1937[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10] 游鉴明. 超越性别身体: 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1] 佚名. 纪学堂赛跑[N]. 国闻报, 1899-05-21(3).
- [12] 佚名. 学务处详设运动会文[J]. 四川官报, 1905(30): 26-28.
- [13] 佚名. 孙端开运动会[J]. 绍兴白话报, 1900(92): 2.
- [14] 佚名. 纪运动会[N]. 申报, 1903-06-06(2).
- [15] 佚名. 增定小学生及普通运动会科目[J]. 山东官报, 1905(56): 2.
- [16] 佚名. 四川第一次运动会录[J]. 四川学报, 1905(19): 85-107.
- [17] 佚名. 师范学堂举行运动会[J]. 广益丛报, 1906(3): 35.
- [18] 佚名. 保定学堂大开运动会[N]. 新闻报, 1905-05-26(4).
- [19] 佚名. 记粤省大运动会[N]. 时报, 1906-01-20(5).
- [20] 佚名. 吉林学界第一次运动会[J]. 北洋官报, 1908(1758): 1-12.
- [21] 佚名. 長令省学堂开运动会[J]. 北洋官报, 1905(893-894): 8.
- [22] 而非. 运动会之开会[J]. 云南, 1907(6): 129.
- [23] 佚名. 贵州遵义府师范学堂中学堂第二次运动会摄影[J]. 教育杂志, 1910, 2(4): 1.
- [24] 佚名. 北京大学堂运动会次序表[J]. 教育杂志(天津), 1905(7): 55.
- [25] 佚名. 汇录江宁学务公所为会议文武学堂举行运动会事致各学堂函件[J]. 南洋官报, 1907(93): 34-45.
- [26] 程清. 丙午日本游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40-43.
- [27] 佚名. 运动会盛观[N]. 盛京时报, 1906-11-17(3).
- [28] 桑兵.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2.
- [29] 佚名. 湘抚札举运动会文[N]. 申报, 1905-07-13(9).
- [30] 佚名. 纪务本女塾运动会[N]. 申报, 1906-05-20(17).

- [31]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 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卷 1898—1911[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93-294.
- [32] 无我生. 京师大学堂运动会记三续前稿[N]. 大公报(天津), 1906-05-06(2).
- [33] 无我生. 京师大学堂运动会记 续昨稿[N]. 大公报(天津), 1906-05-04(2).
- [34] 佚名. 吉林学界第一次运动会[J]. 北洋官报, 1908(1758): 1-14.
- [35] 佚名. 江督札饬合开大运动会[N]. 申报, 1907-09-08(4).
- [36] 王寶平. 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 教育考察记上[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421-422.
- [37] 黄河清. 近现代辞源[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843, 923, 926.
- [38] 李汰, 杨振. 最新陆地运动教科书[M]. 上海: 上海科学书局, 1906: 21-49.
- [39] 李濬之, 盛宣怀. 东隅琐记 愚斋东游日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116.
- [40]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 运动会[M]. 杭州: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 1915: 1.
- [41]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4719.
- [42] 桑兵. 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J]. 历史研究, 1989(6): 13-27.
- [43] 佚名. 永清县学董朱致瀛禀报提学司举行运动会情形文附简章并批[J]. 北洋官报, 1907(1529): 6-7.
- [44] 佚名. 临榆县谭令垚振禀学台开办运动会情形文并批[J]. 北洋官报, 1908(1594): 5.
- [45] 佚名. 春季运动会志盛[N]. 盛京时报, 1909-06-09(5).
- [46] 佚名. 端本学堂运动会[N]. 神州日报, 1907-12-21(7).
- [47] 佚名. 纪龙门师范学校第四次运动会之旨趣[N]. 新闻报, 1907-11-04(18).
- [48] 佚名. 京师大学堂运动大会敬告来宾诸君子文 [N]. 大公报(天津), 1905-05-31(1).
- [49] 璩鑫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542-546.
- [50] 江苏教育总会编辑部. 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六编[M]. 上海: 中国图书公司, 1911: 2-6.
- [51] 邵爽秋. 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M]. 上海: 教育编译馆, 1936: 11-12.
- [52] 佚名. 大事记[J]. 教育杂志, 1911, 3(7): 51-54.
- [53] 佚名. 中央教育会第三次大会纪[N]. 申报, 1911-07-28(5).
- [54] 佚名. 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纪[N]. 申报, 1911-08-08(5).
- [55] 佚名. 中央教育会第十一次大会纪[N]. 申报, 1911-08-10(5).
- [56] 佚名. 提倡各学堂联合运动会[N]. 时报, 1911-09-29(9).
- [57] 朱怙生. 余之提倡体育观[J]. 教育周报, 1911(116): 1-3.
- [58] 佚名. 龙擎虎跃之运动会[N]. 民立报, 1911-04-24(10).
- [59] 田光. 快来 快来 运动会[N]. 民立报, 1911-04-19(10).
- [60] 胡月. 大江东去: 欢送诸同学入联合运动会[J]. 沧浪杂志, 1910(3): 87-88.
- [61] 佚名. 说运动大会[N]. 大公报, 1905-06-01(3).
- [62]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435.
- [63] 佚名. 运动会缘起规则[J]. 教育杂志(天津), 1905(7): 56.
- [64] 佚名. 观模范运动会[N]. 申报, 1905-11-10(2).
- [65] 蔡元培. 运动会的需要[N]. 北京大学日刊, 1922-04-23(1).
- [66] 谭华.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历史流变——评《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J]. 体育学刊, 2024, 31(5): 131-134.

